

推进新型工业化

7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举行《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24)》发布会暨“十五五”时期新型工业化展望学术研讨会,围绕“十五五”时期新型工业化发展路径,与会专家学者提出对策建议,贡献学术智慧。

史丹:稳定推进能源转型为“十五五”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能源是我们生活中的必需品,也是国民经济的血液。当前,产业发展变化以及技术革命对能源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变革。

聚焦“十五五”阶段,我认为能源发展重大变革有三个方面:第一是煤电的低碳化改造关键期;第二是绿色发展的加速期;第三是安全水平的提升期。随着“双碳”目标的临近、国际竞争的加剧以及科技革命的深化,要求能源要实现绿色低碳转型。

政策层面,中央提出要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这与我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相吻合。产业变革的关键影响因素就是碳达峰,中国明确提出2030年“碳达峰”,这是对国际社会的承诺。2024年,我国单位GDP能耗比“十三五”末下降11.6%,是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但与“十五五”目标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进入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期,除了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技术

的发展之外,还有绿色能源技术的快速发展。

从能源角度来说,当前我国能源结构中煤电占比在60%以上,要想“十五五”实现碳达峰,一方面要使用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替代煤电,另一方面还要实现煤炭的低碳化改造。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部门也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出台了相关煤炭低碳化改造政策。

国家从政策上已经有所行动,我认为,煤电低碳化改造应进一步加强,在“十五五”期间要加大资金投入。

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对能源供需和效率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它提高了能源效率,有些公司用云计算和AI智能技术,实现网络传输数据用电量减少40%。例如有的企业在国内一家电厂布局了数字能源管理系统,减少了电力消耗;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又带动了电力需求增长,对电力稳定性也提出更高要求。

戚聿东:以智能制造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新型工业化的“新”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概念,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征。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时期,新型工业化的“新”主要针对传统工业化的粗放模式,核心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

到了党的十八大、十九大阶段,新型工业化的“新”更加突出产业结构优化、“四化”融合与协同。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以来,新型工业化的“新”强调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将高质量发展要求贯穿工业化全过程,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发展,并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的战略目标。

无论是机械化、电气化还是自动化和信息化,工业化的本质都在于国民经济中一系列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不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革。现阶段,数智技术驱动数智产业化和产业数智化快速发展,数据要素作用凸显,并且放大其

他生产要素的效能,新型工业化要求全方位、全流程和全周期推进工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简单说就是实现智能制造。智能制造的作用不仅仅在于降本增效提质,其更深层次的本质是实现从大规模生产向定制化生产的重大转变,在大幅提高生产和交易效率的同时,化解产能过剩问题。

“十四五”时期,我国新型工业化在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创新、转型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十五五”期间,我国新型工业化要紧紧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时代窗口,围绕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重点发展工业新质生产力,加快普及工业互联网基础上的智能制造和定制化生产方式,实现工业领域关键核心高水平自立自强,推进技术标准化建设,夯实工业“五基”,培养“数字人才”,以“智造强国”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

叶振宇:深化区域产业协作推动“十五五”新型工业化

1935年,胡焕庸先生提出了关于中国人口分布的胡焕庸线。近百年来,我国人口分布仍未突破这条线,而制造业及产业链布局也是分布在这条线东侧,这就引发了我们的思考:能否打破这条线的限制,让新型工业化能在广大的西部地区有所覆盖?

我在福建、浙江、宁夏等地调研时发现,习近平总书记推动的山海协作已开展近30年。福建在宁夏的投资企业不少,而且许多浙江企业也到宁夏投资。这让我思考,能否通过深化产业协作推动工业化发展。

过去有观点认为,人口充分流动可以缩小区域差距,如今人口流动已较自由,但进一步通过人口流动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空间有限。因此,通过更大力度促进产业转移、实现产业均衡分布,对解决区域差距至关重要,而这需要区域

产业协作推动。近年来,中西部和部分东部地区已通过区域产业协作,为产业转移创造了条件,且取得一定成效。

未来,尤其在“十五五”期间,城镇化和工业化能否在人口向优势地区集中的过程中,让产业也向更有条件的地区集中,实现二者在空间上更大范围的耦合,这是区域产业协作可以发力的地方。

我们在浙江和福建调研时发现,浙江和福建也是我国城乡收入差异和地区差距较小、老百姓幸福感较强的地方,之所以这样,很重要的原因是两地通过山海协作,实现了产业在省域内更均衡发展。因此,今天谈新型工业化,很多学者关注其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特点,而通过深化区域产业协作,新型工业化也可以更具包容性,这方面值得关注。

黄桂田:加强产业链供应链产业政策支持

受地缘政治和贸易保护主义对产业链重构等因素影响,产业链、供应链、链主企业、链长制等名词,在“十四五”期间逐步成为经济领域的热点。

2017年,长沙率先在全国实施链长制,此后越来越多的省市开始推行链长制。2022年,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确定杭州、武汉、成都、宁德、南通、潍坊、合肥、株洲、广州、深圳、包头、齐齐哈尔12个城市首批开展产业链供应链生态体系建设试点。“十五五”期间,国家会进一步强化产业链供应链方面的建设。

前几年学界还在激烈争论,需不需要产业政策以及需要什么样的产业政策。现在经济发展到了产业链、供应链、链长制,产业政策也由链长牵头推进。今天的产业链供应链,与原来相对粗浅的产业分类完全不一样,面对新的变化,在理论和

实际操作中,我们都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

例如,无论是三次产业分类法、国际标准产业分类、国家标准分类,还是产业组织理论中最严格的按替代程度进行的产业分类,都已经不能满足产业链供应链所要求的更加精准、更加具体的产业分类。

在开放的条件下,产业链供应链是跨省甚至跨国界的,而现在县市区三级都在搞链长制,是否存在相互打架、相互冲突的情况,以及是否会形成地方保护和区域垄断,这是我们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各地的链主企业都是政府遴选出来的,链长也是由政府指定的,一般是政府根据链主企业和产业链的重要程度,然后指定链长。这一过程,如何处理政府和企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也是个关键问题。

赵福军:我国制造业迎来多重发展机遇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格局深刻调整,为我国制造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新兴市场崛起、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为我国制造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制造业“三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转型,推动产业加速升级,而规则不确定性、经贸摩擦加剧等压力,则考验着我国制造业的应变能力。

新兴市场崛起为我国制造业开辟了广阔的出口空间。2023年,作为新兴市场的重要代表金砖国家的贸易总额占全球比重超过2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多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近年来,其经济增长态势良好,与我国发展阶段形成互补。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占比从2014年的约1/4跃升至超50%。

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不仅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机遇,也为我国提升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提供了机遇。技术变革催生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等新

业态,而国际规则尚未完全定型。我国在新能源汽车、太阳能光伏电池、锂电池等“外贸新三样”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若能主动探索建立相关标准,将显著提升制造业国际话语权。

制造业“三化”转型成为产业升级的核心驱动力。人工智能技术的加速运用,促使传统产业升级,如纺织服装行业通过智能设计、柔性生产等模式,提升了其附加值和竞争力。同时,我国作为全球绿色贸易第一大国,在绿色产品、装备和服务领域已形成一定优势。随着全球绿色发展,相关产品的出口需求将持续增长,为制造业开辟新赛道。

然而,全球经贸摩擦的常态化趋势,加大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面对这些不利的挑战,我国制造业需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以国内大循环为支撑,加大研发投入,突破“卡脖子”技术,强化绿色制造和智能制造能力,方能在参与高水平国际循环中占据主动。

江鸿:促进制造业企业基础研究

2023年,我们开展了一项问卷调查,覆盖700多家制造企业及部分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旨在了解不同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结构性特点、面临的困难和政策需求。

从调查情况来看,样本中47.51%的民营企业开展了基础研究,国有企业这一比例为38.60%,民营企业占比稍高。为何会存在这一差异?可能的解释之一是,国有企业资源虽然雄厚,但激励机制存在矛盾。例如,国企高管通常会在任期结束后调离,这使得他们在高风险、长周期的基础研究投资方面可能更为谨慎;而民营企业的企业家如果有强烈的创新抱负,在创新决策上相对更灵活、更激进。

再看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目的是,研究发现,部分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并非为了将现有成果迅速转化为

产品、实现盈利,更多是为了预测产业发展的技术方向,从而明确企业资源积累和投入的方向,为战略判断提供依据。

对于企业没有开展基础研究的原因,约48%的样本企业表示,因没有基础研究需求而未开展;其余一半有基础研究需求但却未开展基础研究的企业中,最大障碍是缺乏人才,而非资金。同时,人才问题对民营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制约比国企更明显。

基于上述发现,建议以增强企业基础研究政策精准性避免运动式基础研究,以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改革牵引推动企业基础研究突破,以强化财政支持牵引构建企业基础研究多元投入机制,以体制机制优化全面提升企业基础研究关键资源丰裕度,不断完善促进企业基础研究的政策环境。

本版摄影/朱高磊



史丹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黄桂田
山西大学校长、教授



戚聿东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赵福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综合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叶振宇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区域经济室主任、研究员



江鸿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跨国公司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